

# 中国文化走出去路径可以更广泛

□岳峰

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输入我国的图书与我们输入美国的比率是150:7,这个现状在并未改观。多数中国学人对此觉得不好接受,但是比20世纪80年代初情况好多了。当时,中国学者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咨询关于中文文献的资源,图书馆员居然问:“中文是什么?是不是像拉丁语那种已经不再使用的语言?”今非昔比,但在英语世界,中国文学也只是小语种文学。可是我们没有必要小瞧自己。清末民初礼仪之争时期,中国儒教习俗在罗马几乎家喻户晓,儒家思想的传播在西欧国家有过至深且巨的影响。从1593年第一部儒经译本问世至今,大约产生了304种儒经译本。现今,中国许多学者出版了汉译英译著,销量也被看好。由此来看,中国图书的输出不存在根本性问题,但要研究怎样输出,即输出的路径。

例如该翻译哪些中国文献?由王尔敏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来看,中国的社会科学文献与自然科学文献都引起过西方的注

意。所以我们外译的题材可以广泛一些。目前,我们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儒家经典或是其他文化经典的输出上。现在,除了汉学家或相近领域的学者,西方人很少关注中国文化经典。历史上西方特别重视了解儒家经典,这与其启动文化交流的需要有关。笔者在《当代外语研究》的翻译微论坛等十多个有代表性的高校外语教师微信群与QQ群进行过问卷调查,不少有留学经历的外语教师在微信群里。问题如“您见过外国人阅读、讨论中国文化经典吗?”笔者得到了111个人的回复,只有5个人对该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他们都在开设汉学专业的大学,其中一个回复说,在某大学有中国文化经典的小阅览室,但是常年不见有人进去。

无论如何,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经典的实际兴趣远低于我们的预期。对于西方人来说,在纽约街头播出的中国短片的冲击力远远高于文化经典,也比文化经典表现出的中国形象现实而可接受得多。翻译中国文献,考虑效益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外译的题材可以广泛一些。在选择图书方面,我们可



以请外国出版商来参与,这比我们自己的选择可能会更准确。

中国学者可能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在国际上走红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品,而是网络小说、武侠小说。这些作品颇受国外青少年迷恋。其实这些小说的翻译有许多问题,但丝毫不影响其销量,这告诉我们,比翻译更重要的是读者的口味。

(摘自《中国社会学报》)

# 幸福的家庭不针对错

人生感悟

□钱静

有人问:幸福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我看到的



最好答案是:幸福的家庭都不针对错。马东主持节目时曾提及他的母亲,他说,76岁的老母亲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关灯,屋里灯亮着,只要没人在,她就第一时间关掉。马东一开始还告诉母亲,一开一关会影响灯的使用寿命,一直亮着也费不了多少电。但在他发现母亲每次说“好”,紧接着又关上之后,马东再也不和母亲计较这样的小事了,因为节约用电已成为母亲的思维定式。

很多人没有像马东那样,而是为了自认为正确的小事和父母争得面红耳赤,伤害了父母的同时,更是让彼此有了隔阂。

夫妻相处也会有分歧。杨绛在《我们仨》里曾说过这样的小事:“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因为一个法文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

语的法国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

可见,如果一定要争个对错,结果往往是赢得了结果,却输了感情,自己也落了个不愉快。遗憾的是,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对一些小事也上纲上线:你想报瑜伽班,他非说买个垫子回家练;你说大海很漂亮,他非说大海淹死过很多人……谁对谁错?不过是看法不同。

生活中,没有三观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比三观更重要的是,你理解我,我理解你,遇到问题不剑拔弩张,不追究谁对谁错。

(摘自《广州日报》)

# “老年食品”来了

生活百科

□云无心

大多数人过了50岁,会觉得以前有滋有味,变得越来越寡淡。人们经常把这归结为上年纪之后的清心寡欲,其实这是老年带来的不可避免生理变化。

没有食欲,也就懒得吃了。吃得少了,不仅热量摄入不足,更重要的是获取全面营养就会变得困难,尤其是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会直接影响身体的健康状态,会加速身体机能的老化,导致免疫力下降,甚至促进慢性疾病的发生。

而保健品“补充”的是某些特定的营养成分。“补充”的成分跟营养失衡导致“缺乏”的成分往往并不一致,所以也就没有了价值。

最新发布的首个老年食品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老年食品通则》(征求意见稿),针对老年人营养需求设定了一个新的食品品

类“老年食品”。按照标准中的定义,“老年食品”是指经改善食物物理性状和(或)调整膳食(营养)成分的种类及含量,以适应咀嚼和(或)吞咽功能下降、营养不良老年人生理特点,满足其饮食需要或营养需求的一类特殊膳食食品。适宜人群为咀嚼吞咽功能下降或营养不良、膳食营养摄入不足的老年人。

“老年食品”有三类。一类是“老年营养配方食品”,只吃它就可以满足基本的营养需求,类似于配方奶粉。这适合于进餐实在困难或者实在不想吃的人,他们可以通过这类食品来保证营养。

另一类是“易食食品”,是常规的食物,只是改变了食物的物理性状,使得它们容易咀嚼和吞咽。这类食物不提供均衡集中的营养,整体的营养均衡还是需要自己把握。

还有一类是“老年营养补充食品”,主要是补充某些容易缺乏的营养成分。这类食物适

□李滨彬 颜昊

港珠澳大桥日前正式全线通车,而建设这一跨海大桥的梦想早在35年前就生根在一个香港人心里,他就是香港实业家胡应湘。早在1983年,胡应湘就首次公开提出港珠澳大桥具体的建设设想和计划,他的前瞻和远见终成现实。

今年83岁的胡应湘精神饱满,几乎每天都会到位于湾仔的合和中心上班。这栋他亲自设计的66层大楼,曾是上世纪80年代亚洲第一高楼。这位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老人一直以工程师自居。

在办公室,胡应湘每天都会将心爱的绘图板上设计图,“这是员工们送我的结婚礼物,都用了48年了。”就是在这张绘图板上,胡应湘勾画出改革开放后广州中国大酒店、广深高速公路、虎门大桥、深圳罗湖和皇岗口岸、沙角电厂等内地旅游、交通、能源基础设施设计图。

“当年,香港经济发达,是转得很快的小齿轮,而内地经济就像是一个刚刚启动的大齿轮。改革开放40年来,小齿轮帮助大齿轮转得更快。今天内地这个大齿轮早已转得更快,反过来帮助香港小齿轮更好地转动。”胡应湘说。

1977年,胡应湘和十几位港商到内地考察,足足待了27天,足迹遍布北京、成都、重庆和武汉等多个城市。

考察过后,胡应湘开始在广州筹建中国大酒店,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内地第一家合资酒店。然而,最大的困难是怎么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条条框框,如何转变观念,胡应湘感

# 当代“愚公”

慨,“当时几乎所有单位职员都是分配的,至于员工素质就没法保证了”。

胡应湘提出,企业需要自主招聘员工并决定薪酬。他与时任主管领导讨论时,拿刚刚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举例:既然教练能自主挑选队员,企业也应该自己选择员工。主管领导被胡应湘的话打动,同意让胡应湘大胆尝试。

投资兴建中国大酒店不仅给广州带来了资金,更意义的胡应湘将“BOT模式”首次引进内地。“BOT模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模式,这是国际通行的私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常用方式。广州市政府和胡应湘的公司约定,广州方面免费提供土地,香港方面筹集资金建设;以20年为期限,其间由港方独立经营,期满全部财产在正常营业情况下移交广州市政府。如今,在胡应湘的会议室里还摆放着一块2004年中国大酒店合作期满纪念的牌匾,上面写着:“敢为人先,铸就辉煌”。在移交酒店的同时,胡应湘还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滑模”技术和设备全部赠送给广州。

胡应湘在美国读书时,亲身体会到州际高速公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促进作用。回港后他就预见,广深一带经济将会高速发



展,车流量一定会迅速增加。因此,他决定向广东提议兴建广深高速公路。

“我当年写信给广东省省长,要经济发展,没有高速公路,没有电力通讯系统是不行的,国家经济要腾飞,就必须优先发展三项事业,即交通、能源和通讯。”胡应湘说。当时内地很多人认为,人们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为何要建设双向六车道的高速公路?胡应湘坚持认为,没有高速公路就没有经济发展。

从1981年签约意向书到1997年全线通车运营,全长122.8公里、总投资122亿元的广深高速公路成为内地第一条合资兴建的高速公路。胡应湘回忆,尽管当时经历许多波折,可以说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项目做成的”,但最终双方合资建成了这条路就是对粤港乃至整个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我是香港的第三代,我的祖父从广东来香港。我一直想看见香港和珠三角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香港的前途。”他说。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黄岚

随着智能手机及智能穿戴设备的出现,我们日常的行为和位置,甚至身体的细微变化,都可能成为被记录和分析的数据。社交网络应用会通过我们的在线活动,巧妙地我们的个人页面上最新的广告。

是否我们的任何行为都会在互联网上留下“痕迹”?硅谷企业云IT信息平台公司、拥有十年银行信息系统运维经验的技术主管武超



# 大数据时代亟须保护隐私

颖认为,“严格来说的话,所有需要注册用户的服务,或多或少都抱有追踪用户某方面信息的目的。服务对个人隐私的读取,事实上无处不在。”在日常生活之外,互联网技术也能详尽地勾勒出一个人在工作中的行为习惯。不过,武超颖表示,“社交化平台的后台数据并不对其他公司开放,以微信为例,目前也不存在与公众号和小程序无关的行为数据统计接口。”

互联网高度发展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让很多“信息”变得更“透明”。对我们而言,互联网提供的方便,足以让我们忽略潜在的隐私风险,很多时候,相关个人信息泄露,还会让某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为了应对潜在的危机,不久前,瑞典有两位开发者打造了一个名为“deseat.me”的

网站,宣称只需简单的操作,就能抹掉自己在互联网上存在过的“痕迹”。但专家指出,该网站底下还是不能彻底“斩草除根”。

最近还有一篇名为《如何让自已优雅地从互联网上“消失”》的“技术帖”也很火,文章的作者阿西恩提出了一些保护个人隐私的方法:尽量少地在社交网络上暴露自己的真实信息;彻底关闭不常用的社交账号,并对任何第三方的程序、小应用保持警惕;如果没办法彻底删除你的存在痕迹,那么至少可以制造一些假象,例如把生日和所在地改掉,或者用看起来不像你邮箱的电子邮件地址注册网络服务。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想从互联网上彻底消失是不可能的,“信息保护的目的不是让信息消失,而是让正确的信息被正确的人用在正确的目的之上”。(摘自《广州日报》)

网海观潮

结婚摆宴席请大家吃饭,本来是件高兴事,可新娘小徐却因此有些不快乐——公司里18个同事,大家合起来给她发了1314元的红包,并祝她和丈夫一生一世。“他们结婚的时候,我至少也要随礼300块钱,可如今到我结婚,却来这么一出。”小徐说,自己看到红包的那一刻,顿时有种被欺负的感觉。

随后,小徐把这件事发到朋友圈里,虽然咽不下这口气,思虑再三她还是屏蔽了同事们。

在份子钱忽忽悠悠不断走高的今天,18个同事包了1314元红包,多乎哉?不多也。一来,这不符合对等原则。我给你们最少300元,你们



却这么对我,合适吗?二来,这也不符合面子原则。中国式婚礼最讲究的是面子。“翻译”出来就是,你收到的红包越大,给你红包的朋友圈越大,则你的面子就越足。平时可能还不至于计较,在结婚的“人生巅峰”,却不能不计较。

无独有偶,《这是一篇关于你本硕博期间份子钱的综述》的文章近日引起了热议。该文引发众多大学

# 份子钱是钱还是情分

生反思:“份子”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没有必要存在。有学生表示:“我拉黑了几个让我去参加婚礼的同学。”也有学生回忆,一年已经送出去3000元。

对于任何中国人来说,份子钱都不是陌生的概念,即将走向社会但已面临人情世故的学生群体也不能例外。在父辈眼中,份子钱的本质就相当于人情置换,送出去的钱早晚也会回来。而对于学生群体来说,份子钱问题就相对没那么乐观了。大多数学生都没有实现经济独立,可承受力较弱。求学历程十几年,同学朋友的数量相当庞大,结婚请帖、满月酒等邀请纷至沓来。相对于父辈来讲,学生群体人情置换的周期较长,且份子钱的回收率也相对较低,毕竟大家天南海北,工作忙碌,没有父辈那种较强的地缘性联系和交流。

如此看来,一个份子钱,实在是蕴藏着传统中国的诸多秘密,很难等闲视之。想象一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已经过去的份子钱,又会带来多少对等回款的期待,以及多少失望与不满?即以小徐而言,其念念不忘之前她随出去的300元,不也是一种隐隐的放贷

心理?让人情合情合理,回归健康正常的状态,是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要求。我们不必去苛责某一个人,而是应该尽量最大限度地减少份子钱的货币价值,加持其情感表达的的成分。这样的切割当然很难,但却势在必行。不然,愈来愈沉重的包袱,必然会压垮一茬一茬的青年。

(摘自光明网)